



1920年代国语文学史的发生与退场

方长安 邬非非

摘要: 1920年代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均以国语为述史准则,并试图从文学史写作和国民教育角度解决国语普及和新文学建设的双重难题。相较于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虽然被时人评为“糟糕”,但是其不仅在叙述起点和分期问题上弥补了胡适文学史著存留的遗憾,而且在如何兼顾国语标准和文学审美性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独见,反衬出胡适文学史著意图先行写作方式的弊端。当然,胡适《国语文学史》作为第一部从国语角度编纂的文学史著,首次把国家民族概念融入文学史构建及文学批评创作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1928年,胡适著《白话文学史》的出现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体现了胡适对新文学发展和文学史写作的重新思考,并展示出20世纪初文学思潮转换的历史背景。而退场之后的国语文学史并未完全消失,仍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影响着新文学建设和文学史书写,也提供了从语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关键词: 胡适;凌独见;《国语文学史》;《新著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 I209.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3-0095-12

1921年,胡适编著出《国语文学史》讲义,“国语”作为关键词进入文学史叙述,新的述史观念、模式成为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体现。而仅仅过了六年,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在此期间,除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以“国语”冠名的文学史著还有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但是这两本国语文学史著在当时都未得到人们的肯定,《新著国语文学史》甚至被批评为“糟糕”^①。实际上,这两本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写作早期的国语文学史著隐含着民族国家意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更是对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一次“史”的实践,影响着文学经典的重塑和新文学的走向。可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虽然较早地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但是相关研究成果多通过发掘其平民意识、进化史观以揭示此本文学史区别于之前中国文学史著的时代意义,对于《国语文学史》所蕴含的国语内涵关注不够。那么,为何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概念代入文学史著后,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被批评为“糟糕”?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内,国语文学史的历史为何如此短暂?两本国语文学史著在历史中的发生与退场究竟给中国文学史书写乃至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哪些影响,它们的价值、意义何在?

一、国语教育与国语文学史发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认识到中国只是万国之一而非天下之中心的中国知识者发觉

^① 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08-07。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立一民族国家而已”^①。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源自中国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所带来的危机感。在天下向国家、民族概念的现代转换下,臣民变为国民,民的形象和素质成为国家存亡兴废的关键。开启民智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古代繁难的文字符号使得知识普及难以实现。在日本明治维新文字改革的启发下,中国文字改革先驱者们开始审视语言文字以期变革。作为民族国家共同语的国语概念,一经传入就被语言学家冠名于语言文字改革,改革成果也被试图运用于国民教育。

晚清切音字最初倡导者卢赣章写到:“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又言:“当以一腔为主脑。19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16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19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②国语运动伊始,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是其目标。但是直至民国三四年间,编纂国定小学教科书时,“只把第一册勉强用些言文接近的句子;第二册将‘的’‘么’‘这’‘那’等字附在课后,以与课文中‘之’‘乎’‘彼’‘此’对照,但终于被删去。”^③黎锦熙曾描述过民国六年国语入文的情形:“不但是做文章,就是平常朋友间通信,除开有时援引几句语录,摹仿‘讲学’的口吻外,也从来没有用过一句白话。”^④可见,即使经历了卢赣章切音新字的创立、王照官话字母的宣传、劳乃宣简字的传播等几十年的语言文字运动,也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合一。同时,1920年代初发生的京音、国音之争中,实际上无法普及的混合音的出现以及盲目的两音争论本身也宣告了国语统一离预期的效果还存在差距。经历了多年努力的国语运动陷入困境。而据胡适回忆,文学革命开始于他对如何改良语言文字以启蒙广大民众的思考,并成型于胡适和梅觐庄、任叔永关于白话是否可以作文学,尤其能否做诗的争辩^⑤。新文学发起者从改良中国语言文字入手,并围绕死语、活语,死文学、活文学进行文学革命论争。正因如此,新文学倡导者很快注意到国语运动所提倡的言文一致和白话的内在联系,并自然地将国语与文学相联系。1917年陈独秀答复胡适书信时写道:“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⑥同时明确将古文文学视为国语文学的对立。而国语运动在教育普及和国语统一方面的失败,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将一直以来国语无法普及归因于国语运动主导者的心态:“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用王树枏《故旧文存》自序中语)。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了:上等人认汉字,念八股,做古文;下等人认字母,读拼音文字的书报。”^⑦他认为这种片面提倡国语的方法根本无法达到启蒙的目的,因为“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⑧若要启蒙民众并使之信服,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言文一致,就要打破阶级划分,有全民皆用的语言文字,并且用这种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使民众愿意使用。能满足这两点的文字就是国语文。以此思考为基点,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喊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指出“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⑨。新文学建设成为国语确立的必由之路。提倡国语不再局限于国语字典和国语教科书的

①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99.

②卢赣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2-3.

③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108.

④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68.

⑤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3-27.

⑥陈独秀.通信.新青年,1917,3(3).

⑦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导言13.

⑧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导言13-14.

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4).

编纂,白话文学开始借国语身份介入国民教育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自此,新文学范式的建立和国语标准的确立有了在文学领域内部得到统一的可能性。而在胡适等一班新文学发起者看来,在新文学出产品并不丰厚的状况下,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①是不足以确立这个标准的。既然新文学创作储备不足,梳理古典文学脉络、筛选已有文学就成了创立标准国语文学的重要参考。同时,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出发,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找寻历史进化的依据也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历史纵向叙述的新型方式,以教学讲义的形式,进入了国语文学倡导者们的视野。

“民国九年,教育部命令:从本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②民国学校开始改用国语教学,国语教育得以正式确立,自然急需大量国语教材和国语教师。同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聘请胡适、黎锦熙、钱玄同、蔡元培等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开讲,目的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国语教师代表。1921年胡适担任国语文学史授课教师,其编写的15篇讲义是《国语文学史》的最初底本。1922年去南开讲演时,胡适删去了原讲义的一部分,将原先的十五讲归并为三编,这个便是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公开印行的《国语文学史》底本^③。“国语文学史”由此面世。

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汇集了全国各地选送的教师代表,胡适称这些人是“国语的传道者、国语的先锋队、为国语下种子的人”^④。凌独见是浙江省选派的国语学员,并在国语讲习所毕业之后被邀请去浙江省教育会附设国语传习所教授国语文学史课程,以此为契机,他编纂了《新著国语文学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其文学史命名中新著二字正是相较胡适《国语文学史》而言。

纵观民国时期文学史著目录,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是仅存的两部被冠以国语二字公开发行的文学史著。这两部文学史以国语为标准审视,从文学史著的角度践行国语的文学观念,堪称首创。这一实践不仅引领国语运动走出历史困境,也为新文学创作标示出国语范本与发展逻辑。

二、“糟糕的”《新著国语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以国语为述史准则产出的两枚文学史著果实不仅未得到肯定评价,反而屡遭贬损。胡适自己评价其《国语文学史》是“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⑤。凌独见称其《新著国语文学史》“不过是部‘读书录’罢了”^⑥。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批评凌氏文学史“其错误可笑之处真触目皆是”^⑦。不仅如此,民国十三年八月七日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署名衣萍^⑧的文章,名为《糟糕的国语文学史》^⑨。文中言辞激烈,称凌氏文学史^⑩是“糟糕的”,并称首次用“糟糕”一词形容凌氏文学史的人正是胡适^⑪。笔者并未在胡适的文章中找到任何对凌氏文学史的直接评价,至于胡适是否称其为“糟糕”,我们不得而知。章衣萍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他认为“糟糕”的理由:一是一部分抄袭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二是未抄袭的部分“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

①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导言1.

②胡适.国语标准与国语.新教育,1921,3(1).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自序1-7.

④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教育杂志,1921,13(11).

⑤胡适.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自序7.

⑥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自序2.

⑦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京:北新书局,1932:自序3.

⑧即章衣萍,曾由胡适推荐进入北大预科听课,并做过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是胡适曾照顾过的青年学子之一.

⑨章衣萍.糟糕的国语文学史.晨报副刊,1924-08-07.

⑩为叙述方便起见,以下凡提及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均写为凌氏文学史.

⑪章衣萍在《糟糕的国语文学史》一文中写道:“‘何往’先生……笑嘻嘻的对着桌上的《国语文学史》说:‘糟糕,商务印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并在后文中指明“何往”先生就是胡适。

日”^①。胡适《国语文学史》成为章衣萍评判凌氏文学史好坏的重要标尺。诚然,胡适作为国语文学的倡导者,其《国语文学史》在中国“国语文学史”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那么凌氏文学史相较于胡适《国语文学史》,是否如章衣萍所说如此“糟糕”?为何新文学建设理论中意义重大的国语的文学代入这两本文学史著后,均未得到肯定的评价?

章衣萍所说的凌氏文学史“抄袭”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该如何理解呢?对比两部著作,凌氏文学史中的一些观点确实和胡适极为一致,只不过换了些表达语词。在论及汉朝散文时,凌独见写道:“元来汉朝国语散文也很多,不过我们没有工夫去寻他,现在且把胡适之先生《国语文学史》里所引的那一段抄过来,虽然是一斑,却可即此推知全豹了。”^②“抄过来”是一种事实。后文中引王褒的《僮约》时选取的句段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完全相同,而且评价的部分也与胡适如出一辙:“这篇东西,多少发笑,假使他用庙堂文学来做便不发笑了……于此,可见庙堂文学是死的,国语文学是活的。”^③对比胡适的原文:“这篇文章所以能使人开口一笑,全靠他把庙堂文学的架子完全收了,故能做出‘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平民文学。”^④类似关于同一文学现象之评价相似的段落较多,如:对南北朝文学中儿女文学的评价^⑤;引杜牧所做的《李戡墓志》以及对杜牧诗作的评价^⑥;论述晚唐五代文学时对南朝儿女文学的评价^⑦,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凌独见是胡适的学生,参加过国语讲习所,经由胡适的讲授介入国语文学史的写作,那么两本书之类似既可认为是直接的“抄袭”,也可以解释为学术传承或所见略同。只是凌独见将“没有功夫去寻他”“把……抄过来”一类的话写于文学史著作中,显得过分随意,不严肃,不规范,这“抄过来”的部分,从学术规范上看,确实“糟糕”。

然而,据凌独见所言,其之所以编写《新著国语文学史》是与胡适有不同的观点:“《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他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要另编呢?……我和胡先生意见上,有大不同的两点:1、他只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2、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⑧关于“国语文学史”的论述起点问题,据黎锦熙记载,当时沈廉士针对胡适仅从汉、魏、六朝为起始编写“国语文学史”一事在《晨报副刊》曾经提出异议^⑨;黎锦熙本人在以《国语文学史》为讲义教授文学史时,也补编了秦以前的部分^⑩。黎锦熙和凌独见补编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汉代以前就存在浅明易懂的白话文学,自然应该入史。其实胡适并非否定此观点,他写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提及他曾在1922年3月24日拟定了一个《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除去引论,在原先的汉魏六朝文学之前加入了两章,即:《两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文章中也有说明:“这个计画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⑪这个修改方案虽然最终没有实行,但是单看目录也可以证明胡适并未否认汉魏六朝以前的文学为国语文学。此外,1928年胡适修改《国语文学史》为《白话文学史》时,也曾写道:“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⑫由此可见,在国语文学史写作的起点问题上,凌氏文学史中把国语文学叙述起点移至唐虞,确实表现出自己的独见,

① 章衣萍. 糟糕的国语文学史. 晨报副刊, 1924-08-07.

② 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51.

③ 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52.

④ 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15.

⑤ 参见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77. 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36.

⑥ 参见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113. 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73-75.

⑦ 参见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142. 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97.

⑧ 凌独见. 新著国语文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自序 1.

⑨ 黎锦熙. 《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4.

⑩ 黎锦熙. 《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27.

⑪ 胡适. 白话文学史. 长沙:岳麓书社, 1986:自序 6.

⑫ 胡适. 白话文学史. 长沙:岳麓书社, 1986:自序 14.

相比胡适著《国语文学史》，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胡适曾与钱玄同讨论过：“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尚有可议者。”^①可见胡适本人对此分期也是多有疑虑。1922年，南开演讲版《国语文学史》作了重大修改：“原稿已成的十四讲，今删去(1)(13)两讲。(2)(3)(4)合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一讲。(5)(6)(7)(8)合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一讲。中间吸收原(12)的大半(禅宗语录)。(9)(10)(11)(14)合为‘两宋的白话文学’一讲，中间也吸收(12)的一小半。原书分两期的计划，至此一齐打破。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②这一更改后的《国语文学史》演讲本除去未述及的中国文学部分，其它部分的分期和凌氏文学史区别并不算大。

综上所述，凌独见本与胡适本之不同部分，不仅不能成为称其“糟糕”的理由，反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存留的缺憾。

不仅如此，凌氏文学史的独特性与贡献，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结构的安排。凌独见认为：“时代生思想，思想生文学，文学是时代的产儿；所以说那一时代的文学，先要说那一时代的情形。”^③所以每一章分为两个部分：“那时代的情形”(文学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和“那时代的文学”(文学本体叙述)^④。凌独见较早地将时代情形融入文学史书写实践，此举蕴含一定的民族意识。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较早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将民族概念融入中国数千年历史演变中^⑤。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发生的根源归结为时代的发展，并在文学史写作中将“时代”部分独立出来，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不仅交代了文学发生的时代场域，而且通过展示中国文学发展中特定的时代性以凸显中国民族在文学领域的历史变化，符合国语一词的民族内涵。二是从书写工具和传播角度对国语文学的分析。凌独见将国语文学古衰而今盛的原因之一归纳为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日渐成熟：“查我国古代写字。非常烦难！是用刀漆等刻画在石金甲骨竹木上的，这样写字一天能写多少呢？直到周的邢夷造墨代漆，仲由造砚磨墨，秦的蒙恬，用鹿羊等毛制笔；后汉蔡伦，用破布鱼网造纸；从此写字，才方便一点，至于刻板印书，唐朝才发明；机器印书，清朝才从外国输入；这样说来：唐以前的文书，都是用手抄的了；以古比今，古代一人十年的抄写，现在只要一点钟就能印出，国语文学之古衰而今盛，这个或者也是一个缘故？”^⑥三是凌独见注意到胡适《国语文学史》中因国语立场过于看重作品的白话属性而舍弃了许多颇具审美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凌氏文学史叙述过程中经常出现对某一文学作品大加赞赏的同时，不无惋惜地发出“真是天地间的至文！可惜国文^⑦的色彩浓了一点”^⑧的叹息。《新著国语文学史》中类似评价的作品有：司马相如、司马迁、王充的作品，诸葛亮《出师表》，昭明太子的《文选》，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管仲的《答齐桓》，陶渊明诗文等等。正因为对文学审美性的重视，凌独见虽然认同胡适最普通的，最浅明的文学即是国语文学的观念，但是他却认为在追求白话的平民文学的同时，不应该降低文学审美性以迎合广大民众：“这种文字(管仲《答齐桓》)，我们不该认他是古文的，读过几年书的人，似乎应该有这样的谈吐；元来我们提倡国语，是期望言文一致的，所谓言文一致，不是把我们的言文放到水平线下面去，是想把平民的言文提到水平线上面来，这一层，我们从事国语的人，多应该彻底谅解。”^⑨可以看出，凌氏文学史在叙述过程中力求在国语标准与文学审美性之间寻求统

①胡适。通信。新青年，1917，3(3)。

②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50。

③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4。

④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5。

⑤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53。

⑥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6-7。

⑦凌独见在其《新著国语文学史》叙述中将国文文学视为国语文学的对立。如，“唐诗，一般人病其浅露，以为是国语文学。而我呢，又咬定是国文文学；这不是我有意立异，实在有我的见地。”(参见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8。)

⑧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53。

⑨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54。

一平衡。

也正是因为凌独见希望兼顾国语和文学审美性,又因其认为“一国的语言,从时间说,有古今的不同;从空间说,有南北的不同”^①。国语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造成了凌氏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没有明晰的国语、文言界限,判断白话与否的标准不稳定而造成其文学史叙述不够成熟,偶尔前后矛盾。如凌独见在《本论》一章中断言唐诗一定是文言的,他解释道,从秦到唐的七百年“韵文则尚辞赋,散文则尚骈俪”^②,在这样的大潮流之中“即使要做白话文,也有些脱不了文言的窠臼”!但后文中白居易的诗文却被他赞为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唐代诗人杜牧、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坛更是被盛赞为国语文学史上的盛唐^③。不过,总体而言,偏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是文学史著作中应有之义。

章衣萍以胡适《国语文学史》为绝对标尺评判凌氏文学史,也值得商榷。胡适称自己有历史癖,其对文学史的研究始于证明文学革命绝不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而是历史的必然^④。为文学革命寻求历史合法性,成为胡适讲述国语文学历史时隐藏的立足点。其不仅将古文与拉丁语相提并论,透过欧洲国语文学的兴起描绘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辉前景,而且通过《国语文学史》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择选建立一条不断进化的白话文学历史脉络,并尊其为文学正宗。将文学史简化为“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⑤。明确的目的性使《国语文学史》不必展示文学历史的全貌,甚至不必努力还原其本来面目,大刀阔斧地截取史料以证明现实目的成为胡适这部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特色。这部《国语文学史》只写到两宋便戛然而止,现存的半部已将胡适选取史料的原则凸显得十分鲜明。胡适的国语文学包含了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的内容:一是以现代白话为标准所选取的浅明易懂的文学作品;二是在古文统治时期寻出的一条平民文学脉络,包括平民创作的民间文学和以平民生活为蓝本创作的文学。对乐府诗、杜甫、白居易、寒山、苏轼、江西诗派的推崇,以及整体趋势上对白话韵文到长短句到宋词元曲再到白话新诗的进化过程的肯定,胡适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证实文学革命所倡导的新国语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国语文学史》的这种写作逻辑符合胡适本人推崇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治学方法。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单纯的目的性使得《国语文学史》成为一本用文学革命的意图阉割过的中国文学史著。

综上所述,作为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就文本评价,确实算不得成熟之作,用它作为评判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的绝对标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凌氏文学史著虽存在抄袭的问题,有其“糟糕”的一面,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独见,在一些方面弥补了胡适《国语文学史》的不足。

三、胡适《国语文学史》的价值

胡适《国语文学史》存在问题,不够成熟,但它是首次从国语角度审视、编纂的文学史著^⑥,开风气之先,它有其它文学史著不具备的价值和意义。

甲午战败,中国被迫重新认知自我和西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摧毁。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积极寻求现代转型的途径,借文学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被视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学改良运动承担着开发民智、塑造新型国民的使命。文学领域的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

①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4.

②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1.

③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13.

④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一文中将这一观点表达得很清晰。为了证明文学革命不是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胡适论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白话文学作品的写定,对于白话文十分重要,文学革命是自古以来文学进化的结果,胡适、陈独秀只是催化剂。所以,可见这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历史的讲述对于文学革命有多么重要了。

⑤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9.

⑥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虽在胡适《国语文学史》前正式出版,但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在先,所以称胡适本是第一部以国语冠名的文学史著作,凌独见本是新著。

行的……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①。以此为开端，清末民初对中国文学的改造始终伴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培育。遗憾的是，虽然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实施了从理论提倡到创作实践的一整套文学变革，但是文学在近代却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中国文学史自创制起就未脱离古典文学经典思维的桎梏。而胡适《国语文学史》对古代经典文学脉络的质疑与弃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立场上对传统思维的反拨，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②。国语的介入，引领文学史著参与到现代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意识建构，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国语理念在文学史著述中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晚清文学国家话语为核心的言说方式。时代赋予文学以国家振兴的重任，个人立场的文学书写被淡化。胡适通过《国语文学史》中的国语向民众传达了文学不应局限于个体言说而应承担起国家责任这一理念。有资格入史的国语文学除了要满足书写媒介为白话的条件之外，书写对象要集中在贫民社会，对“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加以表现，“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子女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③。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切问题，都可写入文学，称之为国语文学。翻阅《国语文学史》，可以看到文人间的闲情唱和，“独怆然而涕下”的个人伤怀不受重视。李商隐的《锦瑟》和吴文英的《锁寒窗》属于个人悲怨情绪表达的作品，被胡适评价为诗、词史上的厄运之作。相反，对《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汉乐府的推崇，对杜甫、白居易的大力褒扬等，无不体现出胡适对社会情形的关注。与《中国兴亡梦》、《新中国未来记》等晚清国家文学不同的是，《国语文学史》所选作品都为古典文学作品，不可能明确以现代国家为言说对象，而是通过所选的国语文学作品的展现以求民众对现代社会情状的关注，以期启蒙，达到建立理想中文物风教^④上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

《国语文学史》在对古文文学、上层文学的反拨中借国语文学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传统，确立了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黎锦熙阅读《国语文学史》汉魏六朝一章后，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做了解释：“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即如当汉初提倡‘古体散文’和‘词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和‘五言诗’也在那儿蓬蓬勃勃的盛行，这是绝不受庙堂体制之拘束的。”^⑤这个解读很能代表胡适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具体到《国语文学史》，以国语标准来取舍中国文学，田野文学或平民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加之之后的《白话文学史》对俗文学和民歌的提倡，可以说胡适用文学史著确立了俗文学、平民文学在历史上的一席之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虽然这个相对偏激的观点在之后的文学研究中一再遭到质疑，但是不可否认胡适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一脉传统，直至今日，民间文学研究仍十分活跃。对国语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几乎同时发生：1918年2月1日——也就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同年——刘半农、沈伊默、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征集学术的、文艺的歌谣；1925年6月21日《国语周刊》公开征求中国谚语和民间文艺。1920年代民间文学专门刊物的诞生，以及对于歌谣和谚语的征集、研究，承接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国语文学史》开创的民间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了民间文学的地位。文学史写作方面，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引入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两章；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专门述及民间文学之整理；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承续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详细叙述鼓词，更以通俗、民间文学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内容：“所述明清文学，全以通俗文学为主”^⑥，践行了胡适以民

①方长安.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2：56.

②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导言 21.

③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1918，4（4）.

④胡适于民国四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切也……矧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曰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参见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8-90.）

⑤黎锦熙. 《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北京文化学社，1927：10-11.

⑥谭正璧. 新编中国文学史. 上海：光明书局，1936 卷头语.

间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史观。

胡适将自己所作《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视为文学革命的两方面:前者为破坏,后者为建设^①。提倡新文学,不仅要破,更要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提出,最终为了“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②。1920年代初期,文学革命刚刚兴起,国语文学概念仅有理论支撑,新文学建设仍处于幼稚阶段,创作很少且水平参差不齐,确立“国语文学”范本十分必要。《国语文学史》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对新文学创作起引领作用。就新诗创作来讲,《国语文学史》提倡以现代白话入诗,经过胡适的最初尝试,成新诗创作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早期白话诗呈现“基本不用韵,不顾及平仄,随情感的起伏变换长短句式”^③的散文化倾向,与《国语文学史》视从五言诗到七言诗到长短句的形式变化为文学的进化观步调一致;现代新诗歌谣化也与《国语文学史》提倡民间文学不无关系,刘半农用江阴方言写作20余首四句头山歌,编成《瓦釜集》,刘大白《田主来》《卖布谣》等诗采用了歌谣的体式。此外,创作最为丰富的小说方面,社会问题小说和社会问题剧的出现,《国语文学史》对关注一切社会情状的提倡功不可没。

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内涵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势必提醒新文学作家们有意识地将个人创作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联系,无论是对民族诗歌形式的继承,还是社会问题小说和戏剧的出现,国语理念对国家民族的过于重视,都存在压抑个人写作的可能,但是国语作为关键词对文学史书写的引导,给初期新文学的“立”划定了范围,规范和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总之,胡适《国语文学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国语冠名的文学史著作,有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的开创意义。胡适从国语进入文学史写作的思考具有历史必然性,向民众昭示了文学所应承载的民族国家重任,提升了民间文学的地位,提供了新的文学史叙述角度,对新文学创作起到指导的作用。其文学史著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语概念本身,对文学史写作以及新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四、《白话文学史》与“国语文学史”退场

1927年,黎锦熙以南开演讲版《国语文学史》为底本,翻印此书,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以一千本为限,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出版。此时胡适身在欧洲,听闻此事,知晓翻印者不为牟利,虽不便责备他们,但由此下定决心修改此书。次年六月修改完毕交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新的文学史除了增补和修改了胡适数年所得文学史料之外,更是改书名《国语文学史》为《白话文学史》,国语二字从此在文学史叙述中隐退,以国语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自此退场。

《白话文学史》编到白居易的诗歌为止,和胡适《中国哲学史》一样,以半部存世。对比《国语文学史》中汉初到白居易的部分,从两万多字增至21万字,增加和调整了相当多的史料。较重要的有:增加了佛教的翻译文学,白话诗人王梵志,并将寒山、拾得从晚唐提到初唐叙述等等。两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无太大变化,仍是以白话、平民文学对立于古文、贵族文学为主线来叙述。但是《白话文学史》入选作品的审美性明显有所增强;评论语气也相对和缓。如虽对曹操复古意味有所微词,但也不能不承认曹氏父子所代表的乐府歌辞“是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④。再者,相比《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形成了更为具体明晰的民歌发展脉络,给新文学挖掘出了一块更为系统全面的文学矿藏。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看似除了史料增加、修改之外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国语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消失,并不仅仅是更换名称这么简单。胡适将国语冠名于文学史著又亲手将其抹去,其中的原委也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1906年,朱文熊结合前人倡议正式提出国语统一口号:“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

①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4).

②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4).

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6.

④胡适.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60.

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①紧接着一直持续不断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国语的选定。声势浩大的京音国音之争双方支持者争论的核心,是哪种语言有资格成为中国唯一的民族语言。语言的唯一性是国语运动追求的根本之一。争论不休之时,胡适从语言特性思考,认为“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②。他将如何解决国语统一背后暗藏的民族统一的问题引到文学之上,“……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外中国民族的惟一工具。”^③胡适所言重点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④放大了白话文学在国语统一中的作用,但是并未明确指出真正的标准国语是什么,模糊了国语作为多民族国家唯一标准语的概念。纵观胡适关于国语问题的讨论文章,以及《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两本文学史著,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统一国语,而是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的筛选和创作使言文真正合一,并通过文学强大的感染力,启蒙广大民众,实现民族疗救的目的。两本文学史著作中表达出的应破除我们、他们的文字、文学贵贱界限,使“赶车的”“卖浆的”都能读懂文学并对其产生兴趣,尤其是独尊平民白话文学等等观点,都指向胡适的兴趣点在文学启蒙,而非国语本身。1921年胡适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上的演讲中说:“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⑤并提醒众人在关注国语的同时,不要忘了文学这个词。“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看似是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双赢,实则国语在文学史叙述中并非不可或缺,而是作为文学的重要定语而存在罢了。

既然胡适并不赞同国语概念暗含的唯一含义,为何要采用国语冠名于文学史著呢?1920年代初的胡适似乎很清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助力,文学革命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影响力:“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来做。”^⑥国语两个字所蕴含的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意思,使得国语运动一直拥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白话文之所以能在体制内取得合法地位,并不仅仅仰仗几位新文学倡导者的振臂一呼,更重要的是民国九年教育部要求民国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的一纸训令。所以,即使胡适本人对国语统一并不支持,也始终努力淡化国语为唯一标准语的概念,并运用于新文学建设之中,但他一开始还是努力从国语角度讲述文学历史,将自己的文学史著称为国语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讲,有着其策略性的考虑。1927年前后,文学革命已尘埃落定,白话化在各领域已日渐普遍,白话与文言的论争已成明日黄花,舍弃国语二字入史的原因便很容易解释了。

《白话文学史》的面世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虽然胡适并未针对文学史著名称的改变作专门的解释,但是《白话文学史》出版同年,《跋·白屋文话》一文将这两个名词区分开了:“‘白话’是个‘中立’的名词,既不含褒贬,又可包括国语的同方言的作品。”^⑦这段话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国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二是白话文学比国语文学的囊括范围更广。胡适曾对国语下过定义: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产生的文学最多的一种方言^⑧。上文谈到胡适并不怎么赞同国语统一,方言文学的发展是他这个论断的主要出发点:“国语文学之外,我看,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一、是吴语文

①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52.

②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01-09.

③胡适.国语与汉字讨论.独立评论1936-06-28(207).

④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4(4).

⑤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01-09.

⑥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教育杂志1921,13(11).

⑦胡适.跋·白屋文话//刘大白.白屋文话.长沙:岳麓书社,2013:86.

⑧胡适.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新青年,1921,9(3).

学……二、是粤语文学……”^①这是胡适 1921 年的演讲,也就是说,在《国语文学史》讲义写作同时,胡适已经开始思考国语的局限性了。那么,方言看似也囊括国语,为何不改为方言文学史?从《国语文学史》中可见,方言是全国各地地方口语的统称^②,包含多种地方语言,且许多方言有怪癖之点,不可能通行于全国,更不可能担起文学启蒙的重任,将方言冠名于文学史,实为不妥。但是白话就有所不同,白有三种解释:“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口,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③白话是加工后的明白清楚的方言,并包含国语。若要替换,白话更为合适。加之白话文学的概念又与文学革命的倡导十分吻合:“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④很明显,胡适是从文学启蒙和文学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来对国语、白话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察的。相较之下,白话比国语更能体现胡适的文学史观。

以上论述结合史料,从几个概念着手,从细微处探讨白话在文学史叙述中替换国语的原因。而从 20 世纪初文学思潮的转换来看,国语消退,白话登场,有着其历史必然性。从晚清文学到“五四”文学,经历了从国家文学^⑤到人的文学的转变。晚清文学为适应时代的诉求,“屈己以就群”,国家与个人对立存在,国家利益为上,个人、自由都退居文学话语的边缘。1918 年《人的文学》发表,宣告晚清国家话语为核心的文学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转变。周作人提倡“文学是个人的”,并将人比喻为“森林中的一株树木”,“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胡适多从国民启蒙的角度考量,更倾向于周作人的观点,关注组成森林的树木。其《国语文学史》以国民使用的白话为创作文学的工具,对平民文学的倡导,自下而上打破社会阶层的文学理念等等,都体现了其以国民为立场的思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提倡人的文学更倾向于有“个我”特性的人:“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的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⑥《国语文学史》为了实现其启蒙目的对文学作品的过度删选,以及对个人化作品的压制,都显示胡适在思考文学史写作时,在文学史写作中用国语这个符号承续了晚清国家文学的国家意识,但《国语文学史》本身却更靠近“五四”对个人文学的推崇。可见国语这个词在《国语文学史》内部呈现出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具体表现于文学史中就是国家意识与人的文学趋向之间的矛盾。胡适也许没有注意到一个语词所带来这种分裂在文学史观念表达中的重要性,但是他看到了国语中国字所带来的局限。所以,胡适使用范围更广、不带有意识形态束缚的白话代替国语继续其文学史写作,使得《白话文学史》更好地融入了“五四”文学的大潮,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更好地体现了其文学史观。

简言之,胡适在其文学史写作中用白话替代国语这一举动,侧面反映了他试图化解《国语文学史》国语概念和个人观念之间的隐性冲突,而造成这一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胡适对于新文学的推崇。这种以新文学为中心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的写作——即使凌氏文学史在作品审美意蕴、文学史叙述模式等方面对胡适《国语文学史》有所补正,也不能掩盖其承续胡适文学史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立场。两本国语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知识秩序之中,中国文学史写作者在经历了以摹仿为主的写作历程之后^⑦,试图将自己对于民族文学未来的想象寄托在文学史这一舶来的样式之中,这种想象也成为了对既有文学进行梳理、剪裁的重要标尺之一。甚至可以说,自 1921 年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诞生起,中国文学史开始了由最初对文学史料的历史编纂向自觉写作的

①胡适. 国语运动与文学. 晨报副刊, 1922-01-09.

②胡适. 国语文学史. 北京: 北京文化学社, 1927: 1.

③胡适. 白话文学史.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自序 13.

④胡适. 白话文学史.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自序 13.

⑤国家文学在这里特指晚清“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以国家话语为中心话语的文学(参见方长安.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 2012: 58.).

⑥方长安.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 2012: 61.

⑦最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多数由外国人写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 1904 年译成汉语的笹川种郎著《历朝文学史》,自林传甲、黄人编写《中国文学史》开始到 1921 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多为仿作,即“多数史著以笹川种郎等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参见付祥喜. 20 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96.)

转变^①。

国语文学史的退场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笔者认为,胡适当年苦心孤诣冠名于文学史著的国语二字在消退时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清末民初,中国从天下的梦中醒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确立民族认同感成为当务之急。虽然一些学者反复言说试图证明“文学的‘美’的特性的见解都被强大的政治文学的潮流所淹没”^②。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所具有的传播特性和强大感染力注定了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政治潮流不可分割,在近代伊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前,文学有着不能拒绝的民族责任。晚清国家文学浓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确实在中国现代转型期间,担负起建立民族认同感的责任。国语概念在文学史叙述以及新文学建设中的消退意味着国家意识的弱化。简言之,国家文学的存在时间过短,以至于还未能深入民众,就很快被人的文学强调的个体意识浪潮所吞没。现代国家观念未真正实现,人的文学其实失去了现代基石。从这一角度看来,国语概念在国语文学史叙述中的隐退为时过早。

《白话文学史》的面世即宣告国语文学史的退场,但退场不是消失,事实上,国语文学史在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中仍潜在地流淌着,而非完全淡出历史舞台。一方面,两本文学史仍在流通: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面向市场出版,商务印书馆“登起大广告”,叫高级中学生买来读,知名出版社加上大力宣传,想必有一定程度的持续影响力;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自1921年出现后,“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③,而且“似乎北大和师大都曾经油印过”^④,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版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是国语文学史课程的普及使得《国语文学史》很大程度上用于学校教育,在文界存在不小的潜在影响力和延续性。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毕竟在《国语文学史》基础上修改而成,延续了《国语文学史》的基本思想、脉络。除了这两个显性的方面以外,《国语文学史》以其独特的方式隐性影响着之后的文学史写作。首先,用白话书写文学史成为当时大部分文学史著者的共识。自《国语文学史》开始,仅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就涌现出例如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史大纲》、赵景深著《中国文学小史》、胡怀琛著《中国文学史概要》、陈冠同著《中国文学史大纲》、贺凯著《中国文学史纲要》、胡云翼著《新著中国文学史》、胡行之著《中国文学史讲话》、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陈子展著《中国文学史讲话》等等一大批以白话作为其叙述语言的文学史著。1928年出版的周群玉著《白话文学史大纲》的白话并非指书中所选材料都是白话,而是专门指作者以白话文写作文学史,更证明了《国语文学史》开创的用白话书写文学史的方式得到认可。其次,中国文学语言由繁到简、由文言到白话的文学进化模式被许多后来的文学史著采用。例如:谭正璧著《中国文学进化史》不仅声明此部文学史“不叙‘载道’的古文”^⑤,而且强调“进化的文学是活文学,他是用当时的活文字来写成的”^⑥。此外,胡毓寰著《中国文学源流》、贺凯著《中国文学史纲要》、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等等文学史著将文学革命倡导的白话文学列为中国文学进化的终点,承续并发展了《国语文学史》开创的以白话文学的进化为脉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再次,出现了一些以底层平民的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史著。如:曹聚仁著《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专述“由平民智识阶级所创作,取材于乡间陋巷,渗透于全民众之内心”^⑦的文学;徐嘉瑞著《中古文学概论》因以叙述平民文学为主而被胡适称为“开先路的书”^⑧;胡行之著《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卷专门述及中国民众文学。这些文学史著沿着《国语文学史》开创的道路,进一步确立了平民文学、民间文学

①1921年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诞生之前,中国的文学史标题绝大部分为中国文学史,少数运用历朝、源流等字样,内容多为梳理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及发展脉络。而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以国语为限定词,融入了作者个人对既有文学的独特看法以及其对未来民族文学的想象。此文学史著的写作方式甚至影响了之后一段时期之内一批文学史的写作,如周群玉著《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1932年)、周作人著《中国新文学源流》(1932年)、陆永恒著《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年)等一批文学史著将白话、新、现代等字眼冠名于文学史著,凸显其文学史写作的核心价值趋向。

②刘纳.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文学评论,1986,3.

③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国语文学史.北京:北京文化学社,1927:3.

④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国语文学史.北京:北京文化学社,1927:4.

⑤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1929:序2.

⑥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光明书局,1929:11.

⑦曹聚仁.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25:1.

⑧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8.

的文学史地位。总之,《国语文学史》的精神在这些文学史著中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延续,这一延续提供了从语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The Occurrence and Vanishment of *Mandarin Literary History* in 1920s

FANG Chang'an & WU Feife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20s, *The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HU Shi and *The New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LING Dujian both took *Mandarin* as the criterion to solve the dual problem of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national education. Comparing to *The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HU Shi, *The New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LING Dujian was considered as *awful*. However, it not only made up for the regret of HU Shi's literary history on starting point and stage, but also reflected the author's own *unique insights*. This showed the disadvantage of HU Shi's literary-history-dominated way of writing. Of course, as the first literary work related to *mandarin*, *The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HU Shi brought the national concept in literary creating. In 1928, *The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HU Shi manifested the vanishing of *Mandarin Literary History*, gave expression to HU Shi's reflection upon China's new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writing, and show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hif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s literary. However, *Mandarin Literary History* did not disappear completely. It still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in explicit and implicit way,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from the angle of language.

Key words: HU Shi; LING Dujian; *The Mandarin Literary History*; *The New Mandar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 收稿日期: 2016-09-28

● 作者地址: 方长安,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fangchangan@126.com

邬非非,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wufeifei1516@126.com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ZW010)

● 责任编辑: 桂 莉